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郭沫若小说创作与现代性想象”（项目编号GY2014C08）成果

康 斌 彭冠龙 张 玫 著

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



四川大学出版社

康 斌，男，1982年生，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已在各类报刊发表论文、影评、随笔20余篇。

彭冠龙，男，1988年生，山东泰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已在《鲁迅研究月刊》等各类学术刊物、文集以及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论文20余篇，主研贵州师范大学社科重点项目1项，参与省级课题项目2项，曾获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贵州省优秀毕业研究生等奖励以及“四川大学学术之星”荣誉称号。

张 玫，女，1982年生，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陈艾婧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五四”时期的郭沫若 / 康
斌, 彭冠龙, 张玫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14-8789-1

I. ①时… II. ①康… ②彭… ③张… III. ①郭沫若
(1892~197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7758 号

书名 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

著 者	康 斌 彭冠龙 张 玫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789-1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4.625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走上“五四”文坛：《女神》散论	(10)
---------------------	--------

第一节 低沉与高昂共存	
——《女神》抒情空间探究	(10)

第二节 郭沫若的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	(22)
--------------------------	--------

第三节 重审新中国成立后《女神》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38)
--------------------------	--------

第二章 精神狂喜与灵魂苦斗	
---------------	--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56)

第一节 “爱情”：现象和问题	(56)
----------------	--------

第二节 爱情三要素	(62)
-----------	--------

第三节 现代与传统的双重变奏	(70)
----------------	--------

第三章 走出“五四”：郭沫若思想转变	(80)
第一节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与郭沫 若思想转变	(80)
第二节 从《前茅》到《恢复》：“戎马”生涯 “书生”气	(98)
小 结	(115)
余论：郭沫若作品的普及与初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	(119)
参考文献	(138)
后 记	(144)

绪 论

对“五四”新文学进行研究，总绕不开一位诗人，他就是郭沫若。在“五四”文坛上，新诗刚刚萌芽，正在迷茫地探索自身前途时，胡适出版了《尝试集》。这一尝试成为一切成功的开始，然而，书中的作品毕竟太平庸，不仅形式上没能完全摆脱旧诗格律的束缚，而且内容上也基本是流水账、大白话，毫无诗味。不久，郭沫若的《女神》出版，成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书中的作品不仅为新诗赋予了“形”，更赋予了“神”，使中国现代新诗成为形神兼备的艺术形式。

说到《女神》，它的文学史形象已经被定格为“诗化了的五四时代精神”。不可否认，《女神》中的一些诗篇正好契合了中国人心中的“五四情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主导情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思潮和事件都可以与“五四”相沟通，我们不断赋予“五四”新的意义，在国人脑海中，那正气浩荡、激情奔腾的岁月似乎从来不曾远去。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女神》，“凤凰”的浴火重生，“天狗”的肆意奔放，笔立山前“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的风景，地球边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呐喊，对新生太

阳的礼赞，对自我的崇拜……这一切内容都与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五四”情景如此贴切。对于这样的阅读感受，只有用一句“《女神》诗化了五四时代精神”才能准确概括。具体来说，《女神》中的部分诗篇与“五四情结”的契合点在于个性张扬的青春激情。中国人心中的“五四时代”，可谓已经“脸谱化”为“以青春之自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春”之胎动、“自我”之觉醒，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中的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已经结束，新的“民国”已经开始。在多元文化的启蒙下，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变得强烈，他们激情洋溢、活力四射，以自己的思考和行为自觉肩负起涤除旧物、重造乾坤的使命，一个古老的国度突然焕发了青春活力。这恰好是《女神》中凤凰涅槃、“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的图景，“晨安！我年轻的祖国呀！/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这样的诗句仿佛就是那个时代青年们共同的歌声，“我赞美我自己！”“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这样的诗句仿佛就是那个时代个性张扬的旋律。整部诗集中那些“天狗”般肆意奔腾的诗句与激荡着中国人的“五四”时代个性张扬的青春激情，有着精神上的连通，这种连通为我们想象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抽象而迷人的文学图景。在这层意义上，《女神》“诗化五四时代精神”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然而，这种合理性也向我们昭示了局限性。上述与《女神》部分诗篇阅读感受相连通的“五四”，是作为一种情结的“五四”，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五四”，而在文学史书写中，应该面对的是这部诗集与文

学史上的“五四”的关系，这就出现了《女神》“文学史”形象与现有形象所指向的领域之间的错位。当我们沉浸在这种“五四想象”之中的时候，《女神》“诗化五四时代精神”这一论断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回到客观的文学研究领域，会发现这一论断为我们研究这部诗集造成了遮蔽。

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探讨《女神》与“五四”的关系，首先应该着眼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在异国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从各类传记和材料来看，他目睹了异国的强盛和相比之下祖国的落后，感受了生活于他乡的艰辛和孤独，渴求西方先进文明下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并由此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有过成功、欢笑和自负。这些人生体验决定了他的内心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其中有青春激情，有个性张扬，更有求知心切、游子思乡、沉醉美景、惬意徜徉，还有对自由、平等、和平的向往，关于凄凉、泪水、死亡的哀伤，乃至灵与肉的纠缠、心与形的对抗。需要指出的是，与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相区别，郭沫若的这些感受要么是在世界展望中获得的，要么是在西方文化浸染下获得的，要么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冲击下获得的，带有现代文明笼罩下出现的新质。郭沫若认为：“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女神》中的全部作品，正是郭沫若“心中的诗意诗境”的艺术表现，由于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此无法一一

举例，但通过对每一首诗的阅读感受，我们能对其内心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切的体会。从郭沫若而联想到同时代的所有青年知识分子，比如郁达夫、鲁迅、茅盾、张资平、庐隐等，他们虽然气质、性格迥异，但无不表现出与郭沫若相同或相近的复杂心境，这是属于那一代人的共通的精神状态。如果一定要说《女神》“诗化了五四时代的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女神》“诗化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从这一层面来看，用“个性张扬、青春激情的时代精神”来衡量《女神》就显得简单片面、单薄无力了。

其次，还应该着眼于《女神》与“五四”时代文学思潮的关系。白话新诗创作滥觞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初，越来越多的文艺报刊开始欢迎这种新颖的诗歌体裁，并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但由于“产量”低，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郭沫若创作白话新诗，一开始与“五四”白话新诗创作潮流无关，其最初的、最直接的创作动机是爱情：“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安娜）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而造成他第一次诗歌创作的爆发则与“五四”白话新诗创作潮流有直接关系，当他看到了《学灯》上刊载的白话诗，“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1918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寄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

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可以说，是白话新诗创作潮流引起了郭沫若的参与意识，从而催生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作者的挑选、整理，结集为《女神》，因此，《女神》是在“五四”时代文学思潮的感召下诞生的。在当时普遍注重中国诗歌形体解放的情况下，《女神》第一次带来了内在情绪的更新。

除了诗歌成就外，郭沫若的小说也值得称道，其“自叙传”性质的作品集中展现了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交融的现代爱情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极广，爱情是其中极其重要的议题，但爱情话语纷纭却始终难以对象化。现代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特点？郭沫若早期以情爱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抒情小说具体入微地提出了他对爱情议题的独特见解。他以女性的美好面容、精神的高峰体验和灵肉结合的彻底愉悦为三大内核的爱情书写，展示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反传统效果。但是爱欲延迟、梦境虚化等书写手段的频繁使用，也每每呈现了作家内心中传统和现代的斗争与纠结。对郭沫若爱情书写的探讨，既能重构郭沫若的现代反抗精神，同时也能更准确地显示“五四”一代的精神复杂性。

郭沫若的小说中反复呈现了爱情产生的三要素。一是女性的美好面容。中外文学中不乏对女性美的描摹，创造社的成员也都擅长写女性，而郭沫若则将具有美丽面容的女性视为至高的价值载体。如《喀尔美萝姑娘》中“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富有生命”的卖喀尔美萝（甜饼）的日本女孩，《残春》中有着“纤巧的面庞”的S姑娘，《漂流三

部曲》中眉间有一种“圣洁的光辉”的“瑞华”等。如果不是简单地对郭沫若进行道德批判，那么我们会看到这种似乎自古皆有的“爱美之心”或者“以貌取人”的行为背后全新的时代意义——对女性的高度尊重，对女性所代表的民主和平的价值的价值的高扬，即郭沫若在《〈浮士德〉简论》中极力强调的：“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其流弊是专制独裁，女性的象征是慈爱宽恕，其极致是民主和平。以男性从属于女性，即是以慈爱宽恕为存心的独立自主，反专制独裁的民主和平。这应该是人类幸福的可靠保障吧。”

二是爱情带来了高峰体验。这种极度欣喜的癫狂状态不能仅仅看作是身体欲望的瞬间释放，更应该视为一个张扬自我的现代个人通过动人的美貌、全身心的情感投入、平等的性别立场、开放大胆的心灵世界获得的一份全新的现代性体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爱情的狂喜催生了一个跨时代的伟大诗人。郭沫若曾说：“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在其叙事作品中，高峰体验被描述得更加具体。如《残春》中，“我”与S姑娘只有一面之缘，便在当晚梦见与之山头互诉衷肠。《喀尔美萝姑娘》中，一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致使“我”抛妻弃子。在《落叶》中，菊子不惜抛弃父母亲也要和恋人结合在一起。这种爱情狂喜和迷乱的体验，发展到巅峰，便是死亡意识的抬头。《叶罗提之墓》中，“我”因心爱的嫂嫂去世而吞顶针而亡；《落叶》中，菊子难以

忍受两地相恋之苦，感叹“我真个想索性死了的好”；《喀尔美萝姑娘》中，“我”为了追逐喀尔美萝姑娘的幻象，抑郁自杀。作家笔下的“死”，显然并不是在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提供理论论证的刻板案例。对投入者或深陷者来说，浓烈的爱情不仅仅是情感的变化，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剧烈的摇晃和改变。

三是灵肉合一的性爱关系。中国文学艺术中对身体的健康理解，来自“五四”以来观念的启蒙和革命。但这种启蒙和革命的观念如果要成为文学艺术自身的一部分，就必须化身为具体的文本，在具体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中得到表现。这种备受压抑但却一直存在的需求，这种启蒙和革命的观念，都在郭沫若的小说中得到了倾诉和肉身化的表达窗口。当然，郭沫若的爱情书写并不是肉欲的单纯展示，而是追求灵魂的融合，即使有性，那也一定是与灵魂结合的产物。郭沫若曾经如此评价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这段话其实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自己的写作特征和效果。

当然，郭沫若这种把爱情看作无上价值的现代“浪漫爱”并不是一个天赋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突然的天才想象，而是有着重要的生发基础——日本体验，尤其是在日本的情爱乃至性爱生活体验。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超越民

族、背叛家庭的极度热烈的恋爱和婚姻本身就是现代爱情的体现，也让郭沫若本人对现代爱情有了更深刻贴己的发现。然而，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传统道德熏陶的现代个人，即使曾宣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但其内心中传统和现代的苦斗纠结，仍然在文本层面曲折地暴露出来。我们发现，郭沫若往往在其爱情叙事作品中使用梦境虚化和爱欲延迟等道德干预的手段，使其在性与爱的关系处理上每每呈现出并不洒脱奔放的态度。而这种文本处理方式也许映照的恰恰是郭沫若热情而激烈情感背后的隐忍、犹豫的一面。

所以，如果说郭沫若在《女神》中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反叛的、无所畏惧的“大我”形象的话，那么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则看到了一个勇敢追求自由生命状态却始终未能贯彻彻底的“小我”形象。他的小说主人公确实希望超越婚姻和家庭的传统定义，挣脱世俗道德早已为个人设定的人生道路，获得彻底解放的自由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是某种单一人生理念的载体，而是郭沫若复杂灵魂的曲折体现。他并没有如早期创造社宣称的那样“为艺术而艺术”，恰恰相反，在自由和责任、传统与现代等矛盾间不断地纠葛调适中，郭沫若没有成为一位形而上意义的现代自由观念的纯粹旗手，而是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时代生活和个性体验的复杂性。这个徘徊在精神狂喜和灵魂苦斗中的郭沫若形象恰是我们长久以来忽略的。

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郭沫若接受了“革命”思想，并翻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开端。在亲身经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他逐渐走

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意识，开始成为一名革命者。从走上“五四”文坛到走出“五四”，不仅是郭沫若身份的转型，更是其思想的转型。对这一过程进行探讨，将从另一个侧面对他的思想转变进行深入探究。

第一章 走上“五四”文坛： 《女神》散论

郭沫若走上“五四”文坛，是以诗集《女神》为开端的。如果说胡适的《尝试集》为“五四”新诗赋予了“形”，那么《女神》则为“五四”新诗赋予了“神”。然而，对这部诗集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总体来说，主要表现为没有真正将这部诗集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看待。因此，恢复《女神》的真实身份——一部诗集，并基于真实的阅读感受进行研究，是目前亟待推进的。

第一节 低沉与高昂共存

——《女神》抒情空间探究

“五四”初期，中国文学正在酝酿一场大变革，一批文人学者艰难地探索改革之路，他们要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们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他们发出了大胆的革命宣言，但他们却进行着孤独的文学实验，以求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时候，“忽地一个人用海潮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

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①。

《女神》在形式上是自由而不散漫的，在内容上是奔放而不放肆的。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女神》都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中早期的一部杰作。不过，仅这些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女神》的里程碑意义应该根源于更深层的因素。

诗歌作为一种抒情作品，“是一种以形式化的话语组织来表现作家内心情感活动的文学作品类型”，“它突出话语的可感性，使之具有很强的表现力”。^②因此，诗歌需要一个富有张力的抒情空间来容纳诗人心中的复杂感情，使之能够感染读者，而不是仅仅依靠诗歌外在的形式和内容。这个富有张力的抒情空间的成功开拓，才是《女神》里程碑意义的根源。

《女神》与《尝试集》出版于同一个时代，且出版日期相隔很近，但从所载诗歌本身来看，二者在抒情空间方面却差别很大。《尝试集》中的每一首诗都没能形成一个抒情空间，只是靠单纯的文字来表达作者的感情，比如《两只蝴蝶》《罪与爱》《死者》等。这可以看作是《尝试集》带有浓厚的旧诗痕迹和词曲气息^③的原因之一。

郭沫若主张：“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

①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创造周报》，1923年第4期。

②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③ 胡适：《尝试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来的 Melody，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①从这个主张中，我们能够看出，郭沫若要求诗中必须包含诗人心中的复杂感情，包含“生的颤动，灵的喊叫”，诗要有“诗意诗境”。对于“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的容纳，就使诗拥有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抒情空间，在《女神》中具体地表现为一个低沉与高昂共存的抒情空间。

在《女神》中，我们能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一是低沉的情绪，二是高昂的情绪。比如，《巨炮之教训》中穷兵黩武使人们“眼儿恐怕已经望穿”的低沉，《雪朝》中“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的高昂，《心灯》中“吹灭了空中的太阳，/吹熄了胸中的灯亮”的低沉，《凤凰涅槃》中凤凰更生时“只有欢唱”的高昂，等等。就在低沉与高昂这两种情绪的二律背反中，构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抒情空间。

这样一个抒情空间的形成，似乎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投射。“五四”时代首先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的狂飙突进的时代，是一个高昂进取的时代，同时，“五四”时代又是一个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民不聊生的低沉情绪充斥于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高昂与低沉共存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抽象，‘时代精神’更多是一种

① 郭沫若：《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